

漢代西南區域內外商貿關係述略<sup>[1]</sup>

官德祥

(香港中國經濟史研究會)

## 緒言

古時西南交通不便，自秦漢統一中國，銳意開拓西南，當地商業得到長足發展。對於交通開發，漢代政府水、陸兩道雙管齊下。先說西南的水路開拓，漢代西南水道縱橫，流經區內水道有嘉陵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長江、烏江、南盤江、瀾滄江、怒江、紅河等。文獻所載早期西南水道交通可上溯到戰國時代。早在秦時，長江上遊已有大舫船運粟的載記。《史記》卷70《張儀傳》載：「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需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sup>[2]</sup>又，《漢書》卷57下《司馬相如傳》：「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sup>[3]</sup>《華陽國志》卷3《蜀志》又曰：「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船舶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sup>[4]</sup>據此可知，西漢政府早已利用水道轉漕巴蜀糧產<sup>[5]</sup>。長江水系運輸量大，這點為漢代西南商貿發展提供一定的優勢。

對於陸路開鑿，漢政府更顯得積極。漢初，政府派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sup>[6]</sup>在開發西南夷時「作者數萬人」，利用大量的巴蜀居民「千里負擔餽饗」。交通開鑿工程艱巨，動員成千上萬，足見漢代政府開拓西南的決心。<sup>[7]</sup>關於漢政府於西南治陸道的具體情形，可從下面幾塊碑刻史料反映一二。按《隸續》卷3《建平縣碑》載記：「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史，石工擊徒要本長廿五丈，賈二萬五千。」<sup>[8]</sup>洪適案：「…石工之文，而云長二十五丈，必是鑿崖治道…其末記其所費，故云賈二萬五千。」<sup>[9]</sup>據《漢書·地理志》載郫縣屬蜀郡。建平屬漢哀帝年號。早於秦時代，秦政府在成都平原修建成都、郫、臨邛三座城市，並且不斷往這裡移民。按此碑所提供的數字可知，漢哀帝時石工價平均一丈值一千。另，《隸釋四·蜀郡太守何君閬道碑》載：「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榷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sup>[9]</sup>建武與中元二年均屬光武時期，兩年號同時出現，不知何解。若解說成閬道工程需橫跨建武和中元，則與千一百九十八日的時間不合。至於碑文提供的信息是治道工程的進度，「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按此速率計，則每丈工程平均需時約廿二日。又，《隸釋·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載：「羊竇道…深谷危峻回遠，百姓患苦。永初六年，青衣尉南安趙孟麟受易由此道…水弱得過，除去危難，行人萬姓，莫不蒙恩…。」<sup>[10]</sup>永初六年，青衣屬蜀郡西部都尉治地，即今日蘆山，而青衣道是當時通西南夷的咽喉要道。<sup>[11]</sup>查上述三塊碑文所載年份，分別為公元前2年、公元57年和公元119年，就工程時間的跨度來看，見到兩漢政府對開拓西南陸路交通從未放棄。

## 第一節 西南域內的商貿往來

西漢前期「海內為一，開關梁」，商賈們能「周流天下」，能「得其所欲」從一個地區流往另一地

區。<sup>[12]</sup>漢代西南商業在此優勢下萌芽。雖然巴蜀地區的地理條件造成一定程度的封閉，但從它與周圍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則證明這些條件限制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克服的。<sup>[13]</sup>大抵而言，漢代西南貿易的輻射範圍，可以分為「區域內」、「周邊地區」和「域外」三個方面。

現先談漢代西南「區域內」的商業活動，主要探討四川與雲南、四川與貴州及雲南與貴州之間的商貿往來。

先說四川與雲南的商貿活動。據文獻所載，秦漢時期，巴蜀、夜郎、滇之間早有路可通。<sup>[14]</sup>就雲南而言，估計部份鐵農具是由四川輸入。1936年在昭通石門坎出土三件東漢鐵鏟，鑄有「蜀郡」、「千萬」字樣；1954年在魯甸出土一件東漢鐵鏟，鑄有「蜀郡」、「成都」銘文，都是標準的巴蜀漢式器物，足證雲南鐵農具是由四川直接輸入。<sup>[15]</sup>從四川宜賓出土「建初四年堂狼造作」洗和「延平元年堂狼造作」洗出土地宜賓南廣鄉，說明漢犍為郡南廣縣境是雲南朱提、堂狼北上四川的通道。<sup>[16]</sup>筆者以為蜀買鐵器向滇地銷售通道當不止一條，在今日昭通、魯甸均發現蜀郡鐵器，能證實是從犍道運來。<sup>[17]</sup>犍道在漢代地理位置重要。漢政府曾在犍道設治所，並成為漢王朝南向發展的起點站。漢的繒帛、枸醬和荔枝便是以此為起點向各地轉輸。犍道成為通向西南夷的一條主要商道。

秦漢時期，四川與雲南之間通道主要有東、西兩條，東道稱五尺道，經宜賓、筠連、大關、昭通而至曲靖，西道稱青衣道<sup>[18]</sup>，又稱犛牛道，經雅安、漢源、西昌、會理，渡金沙江而抵晉寧。涼山地處川滇古道的西道上，早在秦代就已經成為成都平原通往雲南的商賈必經之地。<sup>[19]</sup>四川與雲南交界的地方，由於地形複雜，氣候惡劣。最理想的交通路線，就是利用橫斷山脈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在商業城市貿易的輻射過程中，商業資本一般會向著投資效率高的地區流動。技術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流動，而雲南便是商品輸出的其中一個目的地。<sup>[20]</sup>

四川向雲南主要是輸出鐵器，這加促了雲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據地下鋤頭的發掘報告所載，四川省涼山州和雲南省的漢初墓葬遺址中開始較多地發現從巴蜀地區輸入的鐵器。<sup>[21]</sup>又，涼山地區漢墓與成都平原漢墓有一致現象。涼山地區漢墓的墓主絕大多數是從成都平原遷徙而來的漢民。<sup>[22]</sup>成都居民的遷徙到涼山為該區帶來製鐵農具技術及其使用方法。又，漢初雲南出土鐵器較少，大半為銅鐵合製兵器，僅能加工銅鐵合製器。根據滇貴族所用的銅鐵合製兵器和鐵兵器，使人有理由相信滇國仍依賴從四川輸入鋼鐵料和部分鐵器。<sup>[23]</sup>西漢初，卓王孫的鐵產「傾滇蜀之民」<sup>[24]</sup>、程鄭「冶鑄買椎髻之民」<sup>[25]</sup>便是技術由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流動的最好證明。卓氏在臨邛「即鐵山鼓鑄」進行生產，然後把其生產的物品運輸到南面，向當地的少數民族推銷。他的鐵產無論由開採、生產、加工、運輸和市場推銷都一手包辦。他的生產活動是「工而成之，商而通之」。<sup>[26]</sup>程鄭的成功亦與卓氏相彷彿。程氏同樣集工業和商業於一身，他既是工業家「亦冶鑄」，是大鐵商，並把其產品販運到貴州一帶，向「椎髻之民」行銷。產運銷一體化可從上述兩位西南大商人身上得以體現。<sup>[27]</sup>

西漢中期鐵器在雲南的普遍使用，與四川商賈對雲南的鐵器貿易和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兩者都有密切關係。雖然早在西漢中期，四川與雲南已開始進行鐵商品的貿易。但是最早卻要在東漢時，雲南地區牛耕的使用及鐵農具才得以普及，漢式生活用具才被廣泛使用。東漢時期，南中大姓不僅在經濟上接受中原較高的生產技術，在生活上向中原官僚地方看齊，昭通南中大姓之一孟孝琚的例子便是證明。<sup>[28]</sup>再者，1982年在雲南守望公社白泥井大隊鷄窩院子漢墓出土「大泉五十」50枚，「五銖錢」2200枚。還有在雲南其他地方有兩漢時的貨幣出土，這些都是四川與雲南區間商貿往來的確鑿證據。<sup>[29]</sup>

至於，四川與貴州的商業往來。首先，貴州省的一些遺址中發現從巴蜀地區輸入的鐵器。<sup>[30]</sup>按夜郎地區使用鐵器年代應與整個西南夷地區相近。石寨山滇王墓地相當於戰國西漢初，幾乎都不出鐵器；憑此估計漢初貴州自己仍未出鐵。<sup>[31]</sup>即使到西漢晚期前後，貴州尚無冶鐵業的記載。然而

「耕田」始終是夜郎國的主要生產方式，人民是很需要利用鐵製工具來提高生產力。再者，西漢時期冶鐵業馳名全國的武陽、臨邛兩縣即距南夷不遠。基於上述各點理由，筆者推估貴州地區鐵農具是依靠四川的輸入。<sup>[32]</sup>有學者從地望去審度，認為四川向夜郎輸鐵主要銷往貴州近蜀的北部和西北部，這是有所根據的。<sup>[33]</sup>

按史書記載貴州除了輸入四川鐵器外，還有食鹽。貴州的鹽產相對四川雲南地區確是較少。<sup>[34]</sup>學者朱俊明說：「巴蜀的井鹽為貴州地區的仰求」<sup>[35]</sup>，其言可信。查貴州夜郎僅有在萬壽山提及「本有鹽井」，表示出此鹽井現在並沒有投入生產。<sup>[36]</sup>相反，四川井鹽業分佈廣泛，產量亦多。如《華陽國志》卷3《蜀志》載：「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sup>[37]</sup>僅臨邛一地鹽井二十所，其餘可想而知。另，據《漢書》卷91《蜀卓氏傳》載：「成都羅衰…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羅衰只是四川從事鹽業眾多例子之一。從上可推斷，成都為鹽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古代商賈在通有無；商人進入四川成都購入鹽貨，再到貴州缺鹽地區轉售鹽貨，應有很大可能。

此外，貴州的手工業產品亦是從四川輸入。根據《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說貴州出土之漆器是來自四川，其形制大小與花紋相同，銘文體例一致即可證明。<sup>[38]</sup>又，《貴州興義、興仁漢墓》中出土「銅馬車」，鑄造車馬的原料合金成份，經貴州省冶金設計研究院化驗結果，含銅47.35%、鉛30.7%、錫7.6%。這種分段鑄造，鑲接成形的馬，在四川曾出土。<sup>[39]</sup>綜合種種跡象，使人們有理由推斷貴州的銅應從四川商人手中購入。此外，貴州主要商業區夜郎是「無蠶桑、寡畜產」的地方；只是「耕田，有邑聚」。除卻日常食用如稻米、漁獵物、池塘植物及麻布外，其本身可供交換物資不多。不過，由於其處雲南、四川、嶺南、荊州地區之間，便成為商品流通的主要「走廊」。<sup>[40]</sup>有一點要補充，夜郎統治者「貪漢繒帛」，很渴望得到巴蜀生產的奢侈貨品。商人們看中此點，轉運高檔次商品以厭統治者之慾望，夜郎「邑聚」為他們提供了活動平台。四川商品輸出到夜郎市場貿易，它們主要包括有鐵器、繒帛、枸醬、邛竹杖和蜀布等。

至於貴州與雲南的商賈活動，其概略如下。漢代雲南以滇池為中心，另以越嶲郡及哀牢地區為副中心，三地物產豐盛，部份奇珍異物受到貴州人士所喜愛。貴州西北部威寧、赫章等地與夜郎有關墓葬出土的一些青銅器，如銅鼓、青銅鋤、青銅錫和銅柄鐵劍，其中兩把具有滇池風格，都是從雲南輸入原料，並仿其型鑄造。另外，同一地點出土數以萬計的小粒綠松石、百餘件玉管原料，或是哀牢（永昌）地區所產。赫章出土的水晶、綠松石製品，來源也是哀牢區。<sup>[41]</sup>又，據《太平御覽》卷791引《永昌郡傳》說，夜郎中的句町一帶居民號鳩民「咸以三尺布角割作兩襜」。<sup>[42]</sup>赫章可樂墓出土的盛殮人頭骨的麻布殘片等疑即此三尺布。筆者認為其此等紡織品應是進口自雲南等附近地區。又，根據貴州和雲南的含鉛礦樣品，專家進行鉛同位素測試，據光譜分析推斷貴州銅釜並非在本地製造，而是在雲南與夜郎交界製造，並交流到赫章、興仁、興義等地。<sup>[43]</sup>

## 第二節 西南與國境內各區的商賈往來

漢代西南地區的商業貿易並不止於區域之內，並與區域外國境內的周邊地區進行較遠程的商業貿易，現就「西南與關中地區」、「西南與兩湖地區」、「西南與西北地區」、「西南與嶺南地區」等幾個範圍去考察：

先談西南與關中商賈的往來。西南地區四川與關中早有商業來往。根據在四川省廣漢縣所出土的玉石器，包括玉斧、玉璋、玉琮、玉釧；說明在西周時代即四川地區已經有了與關中相似的禮器。此證明四川地區與關中悠久的商賈關係。<sup>[44]</sup>筆者認為四川與關中的交通孔道能保持通暢是西南地區商業發展的關鍵條件。一般而言，四川到長安的基本路線是主要由成都出發，經廣元沿金牛道、

褒斜道等棧道到達關中，再經長安而轉運，這條道路是蜀與關中交通常用的一條商道。<sup>[45]</sup>蜀地與關中距離最近的交通線無疑是穿越秦嶺至關中平原，然後再進入黃河中下游地區。另一條，是順長江而下，至長江中游後再北上通各黃河中下游。<sup>[46]</sup>自關西地區翻越秦嶺和米倉山——大巴山便進入長江上遊的四川盆地。若以長安為中心，則由京師循褒斜道，經漢中、廣漢以通成都；當中包含「水運與陸運」輾轉運輸在內。<sup>[47]</sup>

四川的商機故然吸引關中商人到來作商業貿易。文獻是有四川商人到關中從商的記述。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建元六年，…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sup>[48]</sup>按此段文字明載「(唐)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這條材料除了帶出蜀商與南越貿易的重要信息外，還透露了蜀商在長安貿易的史實。漢初蜀商在長安經商，故才有「問蜀賈人」之事。又，《漢書》卷91《貨殖列傳》載蜀鹽商羅哀在長安經貿，「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sup>[49]</sup>。上述二例反映出漢代關中蜀商的蹤跡。

漢代西南巴蜀豐富的自然資源吸引了關中大批轉販商人，他們從這裡採購和販賣皮毛、牲畜、礦產、漆器、蜀布到中原各地，所謂「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sup>[50]</sup>四川出產的絲綢、中葯材、枸醬、薑、石器、銅鐵器、竹木製品吸引商人；把之轉輸到關中消費者的手中。<sup>[51]</sup>至於西南的南部雲南，其和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是以四川為橋樑。<sup>[52]</sup>古代雲南不生產銅鏡。但從戰國西漢時期起，貴族墓內偶有銅鏡出土，主要是由中原輸入。<sup>[53]</sup>再者，東漢時，朝廷派官吏往雲南，內地商賈便隨官道攜銅鏡入滇，因此中原內地常見銅鏡亦在雲南有所發現。<sup>[54]</sup>值得注意的是漢時人們喜歡銅鏡銘文中祈願吉祥的祝辭，如熹平三年變形四葉獸首鏡，其銘文為：「熹平三年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鏡，廣漢西蜀，合涑白兼，周刻無極，世得光明，買人大富，長子孫，延年益壽，樂未央兮。」銘文中提到銅鏡鑄造地點：「廣漢西蜀」，即今四川地區。東漢靈帝熹平三年為公元174年，鏡銘文載有「合涑白兼，周刻無極」，目的用以提高在市場競爭力。祝願吉祥語是吸引買家。銅鏡銘文中的廣告語則是反映商品市場的情態。<sup>[55]</sup>

至於西南與兩湖地區的商貿往來。根據地理形勢，自四川盆地順長江而下，出三峽後便進入長江中遊的兩湖地區。江陵、長沙和鄂州三個古都呈倒品字型分布在平原大地上。<sup>[56]</sup>《史記》卷129《貨殖列傳》載：「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其民多賈…」。<sup>[57]</sup>即說明漢武帝時期四川盆地東邊雖然有巫山阻隔，但仍有長江水運交通線的運作。史念海說：「江陵可以西通巫、巴。這是說溯長江而上，經過三峽，可以達到巴蜀各處。…」<sup>[58]</sup>江陵等南方楚地通過南北交往最大的商業城市宛市與長安溝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過這種渠道進入楚地。<sup>[59]</sup>此外，西元1808年在長沙出土一件銅洗，高約7寸，口徑約1尺3寸，底徑約9寸，底部有東漢章帝「章和二年堂狼造」的銘文。<sup>[60]</sup>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漆器製品，有相當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飽」、「成市素」、「市府」、「市府飽」、「市府草」等戳記。江陵鳳凰山8號墓漆器印有「北市」等戳記。根據考證，「成市」、「南鄉」、「北市」戳記的性質既明，便能判斷馬王堆1號墓和鳳凰山8號墓出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製造的。<sup>[61]</sup>四川盆地處在長江上游，由東而西順江水而下。西南地區土、特產商品能載運長江中，「其民多賈」正好利用江水作物流貨運。

又，談西南與西北地區的商貿往來。有學者說探索古代川滇緬印古道的同時，應充分注意到古代西藏在這條交通線上的特殊位置。<sup>[62]</sup>歷史上雲南與西藏之間的通道，大體上相當於人們通常所說的滇藏「茶馬古道」，屬於西南絲綢之路的範疇。此道上限可推至新石器時代。<sup>[63]</sup>考古學家們在雲貴高原多次發現西方的琉璃、寶石、琥珀、水晶等裝飾品。這些裝飾品的使用和製造，主要是通過西藏、滇西地區傳入的。<sup>[64]</sup>雲南用寶石之類作裝飾品比我國北方還早，琉璃、寶石和絲綢一樣，首先

是從四川、雲南與緬甸、印度交通路上開始進行商業上的交流。<sup>[65]</sup>南方絲綢之路線，應該是由蜀郡西部的邛、笮地區，直接穿過西藏到達印度。<sup>[66]</sup>川、藏、印之間的交通，在地理上大體可分為三組，即由西蜀政治中心成都通往川西高原，由川西高原通往西藏，由西藏通往印度。<sup>[67]</sup>據四川新都縣首次出土的「駝舞磚」，可視為研究漢代西北與西南關係提供了實物資料。<sup>[68]</sup>另外，據考古學者的調查四川武勝匡家壩出土漢代磚窯；並根據窯的頂部結構及其後壁和平面圖相比較，發現其與甘肅酒泉、西安北郊漢代磚窯的形制頗為類似。上述都是漢初四川地區就與西北、中原地區在經濟文化上有相互交往的重要旁證。<sup>[69]</sup>

除上述外，漢代四川與河西亦有交往。這在漢簡材料中有所發現。據《敦煌漢簡釋文合校》載：「官屬數十人持校尉印綬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驢是漢代敦煌地區運輸中常用的畜力。在敦煌一帶的民族交往，驢甚至可以作為禮物用來贈送。名曰勞庸，就是遮人耳目。漢簡中的「庸」的含義廣泛，在這指的是僱傭。<sup>[70]</sup>另外，《居延漢簡釋文》載：「出廣漢八稷布十九匹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給吏秩百一人元鳳三年正月盡六月積六月。」（居 90.56,303.30）<sup>[71]</sup>，廣漢是漢代蜀地郡之一。廣漢布即蜀布。王利器案《說文·禾部》：「稷，布八十縷為稷。」《史記·孝景帝》：「今徒隸衣七稷布。」《索隱》：「七稷，蓋今七升布，言其粗，故令衣之者也。」<sup>[72]</sup>簡文意思是某部門所給屬土吏發放廣漢郡出產的八稷布。以布為俸在河西邊塞是常見現象。<sup>[73]</sup>又，按《甘肅武威漢代醫簡》載：「治千金膏藥之蜀椒四升…。付子廿枚，…蜀椒一升…蜀椒…」<sup>[74]</sup>蜀椒此藥，應由四川傳入。《華陽國志》卷1《巴志》有四川藥材的記述。其文載曰：「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椒…。」巴戟其根補腎陽、壯筋骨、祛風濕。天椒即花椒，產於巴蜀者稱蜀椒或巴椒。入藥能溫中祛寒、驅蟲。邊塞寒苦，士卒常患各種疾病；蜀椒成為當地的流行草藥。

綜合上述各簡文，可反映西漢時河西走廊已與蜀郡、廣漢郡在內的蜀地有了直接交往，貨物包括有布和藥物。再者，河西地區考古發現有許多地方與蜀地一致，如河西漢墓、武威雷台漢墓、酒泉下河清漢墓等出土連枝燈及殘片，均與四川蘆山、樂山、綿陽、雲南昭通等地出土類似，其他地區不見；內容上亦與四川等地的搖錢樹有相同地方。<sup>[75]</sup>又，武威雷台漢墓出土的一件外面所扣銅片上鍍金錯銀的夾胎漆尊，經證實為蜀地產品。<sup>[76]</sup>凡此種種物產交流，當中必有不少屬商品，仰賴由商人轉販而得。

此外，還有西南與嶺南地區的商貿往來。秦統一嶺南後，大量的漢人南遷。秦軍南下，商品經濟開始衝擊嶺南地區的原始貿易方式。隨著秦的統一，嶺南開始進入金屬貨幣時期。貨幣的統一，促進了嶺南商貿交流。南越國時期是嶺南地區在歷史上第一次大開發時期，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都取得很大的發展。南越國王趙佗十分重視其與周圍鄰國及漢朝的關係和商業貿易。<sup>[77]</sup>

南越國共九十三年歷史中，大部分時間和中原地區以及西南夷、東越、夜郎等保持著密切的商業貿易關係。從出土資料反映出，南越國銅鑄錢幣僅見半兩錢一種，這些錢是由中原地區流通到嶺南。南越國商人的貿易對象便轉向四川地區的秦代「遷虜」——程鄭；並與蜀地、夜郎等地建立了穩定的貿易聯繫。《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載：「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關市貿易是漢朝對少數民族實行羈縻政策的重要手段，即利用少數民族統治者端好漢代先進手工業品的心理。「關市」的管理是相當嚴格，一方面嚴禁私商出塞交易。另一方面，在交易的商品種類上有嚴格限制，尤其禁運鐵器出境。<sup>[78]</sup>南越鐵器全靠由內地輸進；這內地所指的應是四川。

另有學者認為南越王墓出土青銅容器中「釜」應起源於巴蜀，目前發現出釜的墓，最早應是四川成都戰國早期墓，新都戰國早期蜀國大墓出土有銅釜。釜傳入嶺南是秦漢時事，屬南越國時期的兩廣漢墓發現不少釜。<sup>[79]</sup>另有學者認為「釜甌和釜一樣，是蜀人原先擁有的器物，…戰國晚期秦滅巴蜀，把此類器物帶到其他地方。」<sup>[80]</sup>此外，有人認為「蒜頭壺」在秦漢時期流布至河南、山東、兩湖、

四川、兩廣等地。…提筒主要分佈在兩廣、雲南、越南等地，兩廣共出土銅提筒 20 件…我國的發現，以雲呈頂天子廟墓葬出土的最早。…」<sup>[81]</sup>更有學者對南越國出土的鐵器進行過考察，認為「秦平百越，隨後南越立國，鐵器突然在嶺南出現，而且一開始就表現出相當高水準的鍛鑄工藝，…決不是當地原始的冶煉技術所能製造出來。」<sup>[82]</sup>綜合上述可看出以下幾點。第一，漢代西南與南越地區彼此間的商业貿易是由來已久，而且看來從未間斷。第二，南越國沒有自己的冶鐵業，即使有鐵產，其水平遠不及四川。第三，西南地區的鐵產質素聞名國內，其傳播出番禺的鐵產，應屬於高質素的鐵產品。<sup>[83]</sup>

另外，貴州夜郎與南越彼此間早存有商業貿易。《史記》早有記載，自古四川與南亞的商品便有貿易往來。據《西南夷列傳》載：「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今阿富汗）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sup>[84]</sup>另外，漢武帝時期，貴州夜郎與南越亦存有商業貿易。唐蒙在番禺食到四川出產的枸醬，並從蜀商口中，發現牂柯江這條水道。從此記載可見南越與西南早有貿易往來。漢初西南夷包括夜郎在內，是被閉關蜀徼外；和內地隔絕正常的交往。只有民間商賈從事越界違禁的商品販運。唐蒙在番禺吃到的枸醬，就是蜀地商人竊出越界，偷運夜郎再轉到南越去的。夜郎因臨牂柯江，而「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又因「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sup>[85]</sup>，因此，夜郎到南越順江而下十分方便，商人遂利用牂柯江道（今北盤江百層至雙河口可通行河段）<sup>[86]</sup>貿易。筆者認為枸醬僅是眾商品中的其中一種，經夜郎轉販到南越的商品應有其他，只是枸醬較聞名和普遍而已。<sup>[87]</sup>

筆者認為夜郎和南越在商業貿易中是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說：「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有學者認為邛竹杖和蜀布等奢侈品既可能是蜀商運銷到夜郎，再由夜郎運銷到南越的，亦可能是夜郎從蜀商購得再把它們轉輸給南越。<sup>[88]</sup>蒙文通《古代中國南方與交趾間之民族遷徙》一文便開宗明義說出西南夷與南越的關係。從地理上而言，牂柯郡句町縣，「其地為牂柯南境，與交趾、郁林兩郡相接。」<sup>[89]</sup>彼此地望接近進行商貿活動自然方便。據《貨殖列傳》載越楚地區曰：「番禺亦其一都之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sup>[90]</sup>據此筆者認為番禺之能夠成為商業都會，正由於其地擁有許多來自各地商人帶來貿易的奇珍貨物。

對於漢代西南與域外的商貿往來，史學界最關注的主要是南方絲路境內及境外路段，當中也涉及中、印、緬間貿易等問題。

史學界一般都同意蜀身毒道是西南與印度貿易的古道，儘管仍有部分學者質疑蜀身毒道的存在。<sup>[91]</sup>史學界對於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四川已與印度存在著民間的商业交往，應有共識。<sup>[92]</sup>如楊毓才認為「永昌郡的設置後，蜀身毒道已經開通，巴蜀及滇的商人不斷往來於蜀滇及東南亞各國，由於歷史文獻缺遺，因而後人很難考證，但絕不能因此而否定歷史上滇蜀與東南亞各國在經濟上的交往。實際上遠在公元前 315 年至 300 年前，印度旃陀笈多王朝考第利著作中就提到：「支那產絲馬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這裡所說的絲應指蜀產黃絲，因當時滇國尚不知繅絲技術，只有巴蜀的繅絲和紡織業比較發達，這些巴蜀所產黃絲和絲織品正是由商人通過「蜀身毒道」運至滇池，經葉榆（大理）、滇越（騰越）運到驃國（緬甸），再轉往身毒國的。…因此，遠在公元前 300 年，蜀身毒道在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開通之前，就已經成為由巴蜀經滇西販運黃絲、紐帶等物到緬甸、印度等國的一條絲綢古道了。」<sup>[93]</sup>

此外，有的學者認為羅馬人要想取得中國的絲綢，是通過貴霜和西沙卡統治下的印度。而來自中亞的統治者把印度與中亞聯成一體，於是中國的絲綢、漆器以及其他精美工藝品得以順利通過中亞到達印度西北部，然後經印度人轉手賣給羅馬商人。<sup>[94]</sup>GF Hudson 認為「絲綢是中國所產，但羅馬人卻幾乎全部是從安息人、貴霜人以及別的中介商那裡買來的。」<sup>[95]</sup>據梁加農（賽里斯（Seres）略

考)一文考辨賽里斯地望應在中亞以東,今新疆一帶,中國內地似不是真正生產絲綢地。<sup>[96]</sup>印度本身也有絲綢業,據西方史學記載,印度的蠶絲業是公元前140年由中國傳入的。據考證,在公元前1世紀的貴霜王朝統治時代,生絲便由印度運銷羅馬。<sup>[97]</sup>藍勇則據《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及《史記》卷123〈大宛列傳〉兩則史料看出「從中國西南川西、滇西和滇西南經身毒到大夏有一條民間商道,在乘象國(又叫「騰越」,即今騰沖)設買市中轉站,貿易品由蜀賈偷偷轉運到騰越,再由身毒或大夏商人轉運到身毒或大夏。當然,當時也可能與蜀商直接到天竺。」<sup>[98]</sup>筆者按藍氏之說可取。

又,印度史學家認為貴霜統治者自從佔領巴克特里亞地區,就從那些城市經手的貿易發了財。在阿富汗西北找到的一個公元初的貴霜王族墓地裡,發掘者在6座墳墓中找到了2000多件金器,如來自中國的銅鏡、銀鏡。這裡有來自東西南三個方向的奇珍異寶,有來自西方的青銅藝術品,也有來自中國的漆器。<sup>[99]</sup>也有學者認為繁榮的貿易在印度北方形成了濃厚的商業氣氛。商人的價值觀念難免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大乘佛教的經典中產生了一個新的「七寶」概念,七寶指七種具體的珠寶:金、銀、琉璃、水晶、珊瑚、珍珠、瑪瑙或琥珀。這些珠寶正是歐亞大陸長途貿易中的熱門貨。<sup>[100]</sup>(法)布爾努瓦說:「琉璃實際上可能出自印度的。有人已將「璧流離」一詞比作梵文詞 Vaidurya 和巴利文 Veluriya,本指一種質地細膩的石頭,天青石或天然大水晶。「璧流離」或「琉璃」一詞後來由另一個詞「玻璃」所取代,它在近代漢詞中仍指我們所說的 verre(玻璃)。」<sup>[101]</sup>古代雲南不產琉璃,在境內的琉璃應是來自印度的商品。<sup>[102]</sup>

就商品貿易方面,滇國對外輸出的產品主要有牛、馬等大牲畜、皮毛製品、奇禽異獸、金銀礦產物及燹僮等。從外地輸入的產品有絲綢、銅鏡、弩機、鐵劍及化妝品。還有來自中亞和南亞等地如身彩色琉璃珠、蝕花石髓珠、有翼虎銀帶鉤及金飾片等。滇國墓葬中瑪瑙出土的數量最多,主要集中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兩大墓地。張增祺據滇池出土瑪瑙的外形特徵及微量元素中含鈦較高特點看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瑪瑙珠管,其原料很可能就來自滇池區域。總言之,漢代的琉璃是從外地輸入此點則無疑。滇池地區的石寨山、李家山和天子廟,出土的貯貝器便是用來貯藏貝幣和銅錢,貯存這些「外匯」,專用之於對外商業貿易上。《永昌府文徵》中記載五銖錢共千枚,就是中、緬、印通商時商人遺留下來的。<sup>[103]</sup>有學者研究出古代以海貝為貨幣不是中國獨有,它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印度洋中的馬爾代夫群島即以海貝為貨幣,亞洲許多地方也使用貝幣。鑑於海貝的原產地都在南洋、印度洋一帶,它們必然循著最近的半島和最近的陸地傳入,中國西南是傳播路線的首選。雲南的少數民族一向與印度、緬甸居民交換物資。雲南是中國最早輸入海貝的通道和地方,也是最遲退出使用貝幣的地區,遲至元明的時候,雲南還使用貝幣。<sup>[104]</sup>海貝及貯貝器的出土是雲南與印緬商貿的確證。除了石寨山的海貝外,在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遺址中同樣發現大量海貝。據專家考證,這些海貝與雲南晉寧石寨山中大量海貝十分相似。特別是大量產於印緬海岸的「環紋貝」的發現,無疑證明在公元四世紀至三世紀直到公元二世紀中緬印陸路交通路線確實是存在的,巴蜀地區通過滇西地區與東南亞和南亞很早就有了商業交往。<sup>[105]</sup>

永昌郡是中、緬、印貿易的主要商貿窗口。根據《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載:「(永昌郡)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僚、僂越、裸濮、身毒之民。」<sup>[106]</sup>永昌郡居住了緬甸的驃人和印度人。但有學者質疑身毒之民並非真確。不過,根據昆明羊甫頭的考古發現,身毒之民應該是印度人,這點獲到出土文物的證明。考古學家在羊甫頭發掘了大批滇文化墓葬,其中有不少「林伽」(男根)崇拜遺物(東漢中期)出土,如有青銅鏟柄即作成男根(銅祖)形狀,更多的是人頭漆木祖或動物頭漆木祖。據謝崇安認為它的突然湧現當與早期印度教的「林伽」崇拜信仰傳入有關。昆明羊甫頭的人頭漆木祖實為古印度「一面濕婆林伽像的變體」,其宗教含義相通可能是印度教濕婆林伽教派信仰傳入中國西南民族地區的最早證物。總之,昆明羊甫頭的考古發現

足證前引《南中志》載有關身毒移民記載的可靠性。<sup>[107]</sup>

另外，《大宛列傳》載：「然聞其西（昆明之西）可數千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竄出物者或至焉。」<sup>[108]</sup>滇越，應為今東印度阿薩姆地區的迦摩縷波國。饒宗頤指出在印度 Gujrat《諸蕃志》中的胡茶辣國的 Rangpur 出土古物，有 89 個陶器刻符，其中不少同於中國境內發現的越族陶文。此外，在阿薩姆及中部地區都有百越式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鏃出土，加上兩地陶文符號的雷同可見越人早已人居身毒，而 Rangpur 為後世文獻中所記的滇越或僂越之民。<sup>[109]</sup>又，公元前後，內遷中國西南地區的除了印度移民，還有一部份東南亞土著民，即操南亞孟高棉語的尼格利人種。其典型例子是焦僂種夷的內遷。有學者據《太平御覽》卷 786 引《後漢書》載：「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僂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犂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謝崇安認為焦僂種夷當屬熱帶黑人種的尼格利陀人，其黝黑矮小的體質特徵很接近仍留存生活在馬來亞深山叢林中的原始色曼人。而《後漢書》載焦僂種夷所獻之永昌徼外的犂牛，正與雲南石寨山文化和越東北文化青銅藝術品中的犂牛形象相互引證，是印度犂牛由滇緬印古道輸入中國西南和越北各地的確證。<sup>[110]</sup>

綜合上述出土文物及文獻的相互證明，可知永昌郡乃當時各外國人民集散地，從《華陽國志》卷 4《南中志》載永昌郡條，永昌為「多銀寶貨」之地。內容包括：「黃金、光珠、琥珀、翡翠、蠶桑、猩猩、麝旆、琉璃<sup>[111]</sup>、軻蟲、蚌珠」等。<sup>[112]</sup>《後漢書》卷 86《西南夷哀牢傳》說：「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貉獸」<sup>[113]</sup>當中大部份產物皆非永昌郡特產，是集四方交易而來，是各地外來商人帶來的商品。<sup>[114]</sup>它們主要來自緬甸、印度、伊朗，甚至有遠自紅海、羅馬轉販而來的商品。

## 結語

西南地區在歷史上是我國的戰略後方，是我國對外關係的門戶。其地有近一萬公里的國境線，與南亞和東南亞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緬甸、老撾、越南諸國接壤，與孟加拉、泰國、柬埔寨接近。若果從此一角度去為西南定位，它便是處南亞、東南亞及中國之中心（Central place）位置，成為長安與國際間商業貿易的中轉站。西漢武帝時代以四川為基地，並以夔道為主要中轉站「自夔道指牂柯江」，向東南及西南兩個方面推進。<sup>[115]</sup>東南方直指向貴州，以唐蒙作先頭部隊，西南方直指向蜀身毒道，以張騫為馬首是瞻。武帝雄才大略，帶領政府開發西南，開拓交通，設立郡縣，沿途置亭舍，方便商旅。要知商品貿易乃雙方面的，目的在通有無。隨便舉出漢代西南商品作例，如蜀茶、銅鼓、邛竹杖、梧桐琴、漆器傢具、陶盛器、陶製葬具明器和鐵農具等，它們無論在構思、設計造型、裝璜包裝、商標外觀款式和消費者習慣等都體現了西南地區的文化觀念和知識。更重要的是透過商業貿易，商人的轉販中介角色與及商品本身流通等，產生物質文化的傳播，物質的交流，最終造成中亞各地文化的碰撞與融和。

總括而言，漢代西南與境內、外各地商貿關係能得到長足發展，實與兩漢政府約四百年持續推動有莫大關係。武帝銳意開發西南夷是當中轉折點。武帝把原來巴、蜀經濟區，由四川範圍擴展至雲南、貴州等地，由成都推展至青衣、夔、滇池、夜郎等地，自始川、雲、貴三地的商業命脈漸次打通；形成一個比從前更大的西南商貿圈。至於國際貿易方面，西南絲路成為主要商貿焦點，沿線交通匯點成為國際商品集散市場。東漢設立永昌郡，目的為成都在國際貿易基礎上增添副手，中、緬、印間國際商貿至此得以確立和鞏固。<sup>[116]</sup>

## 註釋：

[1]本文所涉時間由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止，合共427年。西南區域所指範圍大抵以今日四川全省，雲南大部與貴州西部等地，即雲貴高原和四川盆地。其北以大巴山脈為界，西與西康高原毗連，南達今老撾越南邊疆，東迄今湖北湖南西界。

[2]《史記》卷70《張儀傳》，第2290頁。另，譚宗義案：「汶山，汶江發源於此，汶江即今四川岷江，自汶江轉漕成都平原之粟，浮水而下，入長江東出伐楚，較之自漢中進軍為便。蓋長江水道，運輸量既大，復無後顧之憂，自漢中出則韓窺其後焉。張儀之言，容有誇大，然其後司馬錯伐楚即循此道」，見譚宗義《兩漢漕運考》，《大陸雜誌》，第35卷第7期，第208頁；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州域形勢一》，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頁。

[3]《漢書》卷57下《司馬相如傳》，第2577頁。

[4]常璩《華陽國志》卷3《蜀志》，據劉琳《校注》，第194頁。

[5]譚宗義《兩漢漕運考》，《大陸雜誌》，第35卷第7期，第208頁。

[6]《漢書》卷24下《食貨志》，第1157頁。

[7]《漢書》卷24下《食貨志》，第1158頁。

[8]洪適《隸續》，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頁。

[9]洪適《隸釋》，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頁。

[10]洪適《隸釋》，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頁。

[11]胡開祥《秦漢廬山郡縣建置與文化發展之關係》，載《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第40—49頁。

[12]許倬雲說：「看來冶鐵業與地區間貿易、對外貿易是當時獲取巨額財富最常見的途徑…」，可參見 Cho-yun Hsu "Han Agriculture —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B. C. — A. D. 22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Land, 1980., p. 36—37.

[13]孟祥才《論巴蜀在秦漢統一大業中的作用》載《先秦秦漢史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頁。

[14]胡小柳《秦漢時期四川對雲南的經濟文化交流》，載《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第40頁。

[15]胡小柳《秦漢時期四川對雲南的經濟文化交流》，載《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第41頁及周萬利《戰國秦漢時期西南鐵農具的傳播與分佈》載於《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6卷第1期，頁47；李昆聲《雲南文物古跡》，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8頁；雲南昭通魯甸出有上刻「蜀郡」、「蜀郡成都」銘文的鐵甬。及江川李家也有出這類銅鐵合制器物48件。該地區鐵器早先是由四川輸入。「蜀郡鐵甬」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頁。

[16]蔡葵《論雲南東周至漢代的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收錄於其著《考古與古代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頁。

[17]劉復生《楚國與瀘夷——民族遷徙、衝突與融合》，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40頁。

[18]胡開祥《秦漢廬山郡縣建置與文化發展之關係》，載《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第40—49頁。

[19]劉弘《從川滇古道上的漢墓看漢代郵亭》載於《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第15—18頁；吳興南《雲南對外貿易——從傳統到近代化的歷程》，雲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頁；童恩正《略談秦漢時代成都地區的對外貿易》一文中稱為「南道…由此有兩道可達越南，一經元江沿紅河下航，是古老的一條水道，另一條則經彌勒、文山出國境，沿明江而達河內地區」，童氏一文載伍加

倫 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6頁。

[20]參考厲以寧《區域發展新思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頁。

[21]羅二虎《漢時期的中國西南絲綢之路》，載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100頁；華覺明《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頁。

[22]劉弘《從川滇古道上的漢墓看漢代郵亭》，載於《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第15—18頁。

[23]蔡葵《論滇文化出土的鐵器》收錄於其著《考古與古代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頁。

[24]《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7頁。

[25]《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78頁。

[26]《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54頁。

[27]常璩《華陽國志》卷3《蜀志》，據劉琳《校注》，第187頁，《注》8。

[28]李昆聲《雲南藝術史》，雲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47頁；魯剛《雲南昭通東漢〈孟孝琚碑〉史料價值舉隅》《貴州民族研究》(季刊)，1998年第3期，第118—127頁。

[29]胡小柳《秦漢時期四川對雲南的經濟文化交流》，載《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第42頁。

[30]羅二虎《漢時期的中國西南絲綢之路》，載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100頁。

[31]貴州省博物館 威寧縣文化局《威寧中水漢墓》，載《貴州田野四十年》，貴州民族出版社，第143、152及162頁，原載《考古》1981年2期；有關西南夷的銅柄鐵劍，詳見童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載《南方文明》，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83頁及汪寧生《古代雲南和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載《中國西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杜惠榮《略論秦漢時代夜郎設置郡縣的經過》載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夜郎考——討論文集之一》，貴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頁。

[32]周萬利《戰國秦漢時期西南鐵農具的傳播與分佈》載於《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6卷第1期，第47頁。

[33]朱俊明《夜郎史稿》，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頁。

[34]常璩《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據劉琳《校注》，第378頁。

[35]朱俊明《夜郎史稿》，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頁。

[36]常璩《華陽國志》卷4《南中志》，據劉琳《校注》，第382頁。

[37]常璩《華陽國志》卷3《蜀志》，據劉琳《校注》，第218頁。

[38]貴州省博物館《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載《貴州田野四十年》，貴州民族出版社，第205頁，原載《考古學報》1959年1期。

[39]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載《貴州田野四十年》，貴州民族出版社，第279頁，原載《文物》1979年5期。

[40]朱俊明《夜郎史稿》，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頁。另參見唐文元 劉衛國《夜郎文化尋踪》，2002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16頁。

[41]朱俊明《夜郎史稿》，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50頁。

[42]另見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永昌郡傳》，中華書局影印本，1961年版，第375—377頁。

[43]萬輔彬《古夜郎國銅釜的鉛同位素考證》載《夜郎研究》，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

116—121 頁。

[44]馮漢驥 童恩正《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載於《文物》1979 年第 2 期，第 31 頁；宋治民《蜀文化及巴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36—137 頁。

[45]童恩正《略談秦漢時代成都地區的對外貿易》，載伍加倫、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 7 頁。

[46]葛劍雄《關於西南早期文化和交通的幾個問題》，載《葛劍雄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15 頁。

[47]袁庭棟《巴蜀溯源》，遼寧教育出版，1991 年版，第 58 頁。

[48]《史記》卷 116《西南夷列傳》，第 2994 頁。

[49]《漢書》卷 91《貨殖列傳》，第 3690 頁。

[50]《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第 3261 頁。

[51]史蒂文·F·塞奇 楊榮新譯《古代的四川》(續)，《四川文物》，2000 年，第 5 期，第 74—80 頁。

[52]李昆聲《雲南牛耕的起源》，載於《考古》1980 年第 3 期，第 270 頁。

[53]李昆聲《雲南藝術史》，雲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70 頁。

[54]李昆聲《雲南藝術史》，雲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71 頁。

[55]田旭東《漢鏡銘文中的廣告語》收載王子今編《趣味考據》，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64—168 頁。

[56]吳松弟《中國古代都城》，台灣商務，1994 年版，第 52—55 頁。

[57]《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第 3267 頁。

[58]史念海說：「巴蜀之東為楚國的故土，楚國本來都於江陵，…。江陵西通巫、巴，巫縣今為四川巫山縣，乃在巴蜀之東，…。這條水道經過三峽，雖早已開通，卻非易通行，特別是逆水上行，是相當艱難。可能較之棧道為尤甚。司馬遷以巴蜀列入山西，著眼於交通，顯然可見…」，見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學區域經濟地理的創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3, 1—23, 人民大學複印本 K91《中國地理》，第 90—92 頁。另見黃今言《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28 頁。

[59]黃今言《秦漢經濟史述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9 頁。

[60]周春元等《貴州古代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70 頁；蔡葵《論雲南東周至漢代的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載其著《考古與古代史》，雲南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2 頁。

[61]黃今言《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27 頁。

[62]羅開玉《從考古資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聯繫》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 32 頁。

[63]申旭《歷史上的滇藏交通》載：「經研究發現，西藏東部及東南部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與雲南、四川同一時代有著諸多共同之處，如…陶器上見劃紋…建築技術深受雲南、四川古代民族文化的影響…」；見申旭《歷史上的滇藏交通》《中國西南文化研究》第 3 期，第 100 頁。

[64]羅開玉《從考古資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聯繫》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 51 頁。

[65]陳茜《川滇緬印古道初考》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頁第 140 頁。

[66]羅開玉《從考古資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聯繫》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

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54頁。

[67]羅開玉《從考古資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聯繫》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55頁。

[68]高文《淺談四川漢代畫像磚藝術》載於《四川文物》1987年1月，第5頁；王有鵬《四川新都縣發現一批畫像磚》載於《文物》1980年第2期，第56頁，見龔廷方等《巴蜀漢代畫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

[69]陳麗瓊《四川武勝匡家壩漢代磚窯試掘記》，載於《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第63頁。

[70]李永平《簡牘和考古所見漢代河西與蜀地的交往》載《絲綢之路》，2001年第1期，第56頁。

[71]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72]王利器卷第1《本議》注29，中華書局，1996年版，《注109》，第24頁。

[73]李永平《簡牘和考古所見漢代河西與蜀地的交往》載《絲綢之路》，2001年第1期，第56頁。

[74]《甘肅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此外，《文選》《蜀都賦》載：「青珠黃環…」《拾遺記》卷8載：「周群妙閑算術識說，遊岷山採藥。」雖然這兩條資料並未指明是漢代，但也可作為西南地區盛產藥的旁證。

[75]李永平《簡牘和考古所見漢代河西與蜀地的交往》載《絲綢之路》，2001年第1期，第56—57頁。

[76]李永平《簡牘和考古所見漢代河西與蜀地的交往》載《絲綢之路》，2001年第1期，第57頁。

[77]張榮芳、黃森章《南越國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頁。

[78]田昌五、漆俠主編《中國封建經濟史（秦漢部份）》，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428頁。

[79]李龍章《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青銅器研究》載於《考古》1996年第10期，第59—60頁。

[80]李龍章《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青銅器研究》載於《考古》1996年第10期，第60頁。另見，Gernet, Jacques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ng. Trans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96 2nd edition., p. 126—127.

[81]李龍章《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青銅器研究》載於《考古》1996年第10期，第60—61頁。

[82]黃展岳《南越國出土鐵器的初步考察》載於《考古》1996年第3期，第60頁；樊志民《中國古代農業區研究》，《中國農史》，1991年第1期，第4頁。

[83]高凱《秦代謫戍嶺南商人對中原商業經濟意識的傳播》，載《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第136頁。

[84]《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第2995頁。

[85]《漢書》卷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3839頁。昔日漢武帝時唐蒙欲浮船牂牁以制越，武帝遂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詳可參考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20《貴州一》，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241頁。

[86]參見翁家烈《夜郎研究三題》，載《貴州民族研究》，2000年1期，第29—33頁。

[87]有關枸醬，可參考侯紹莊《枸醬考》，載《夜郎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8頁。

[88]呂昭義《對西漢時中印交通的一點看法》載《南亞研究》1984年第2期，第58—67頁（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復印報刊資料K21：先秦、秦漢史）。

[89]蒙文通《古代中國南方與交趾間之民族遷徙》載《越史叢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49—50 頁。另，參見禹明先《貴州夜郎史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討的幾個問題》，載《可樂考古與夜郎文化》，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5—113 頁。

[90]《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第 3268 頁。

[91]呂昭義《對西漢時中印交通的一點看法》載《南亞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58—67 頁（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復印報刊資料 K21：先秦、秦漢史）。

[92]羅二虎《漢時期的中國「西南絲綢之路」》，載於《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1 期，頁 85。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研究概述》載曰：「…以成都為起點，中經雲南至印度、中亞和西亞的「南方絲綢之路」早在商代已初步開辟，表明蜀文化從來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其文載於《文史知識》，2001 年第 7 期，第 117 頁；王益謙《論周邊地緣關係與西南地區沿邊開放》，載《南亞研究季刊》，1996 年第 1 期，第 25—32 頁。

[93]楊毓才《雲南各民族經濟發展史》，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64 頁；申旭《中國西南對外關係史研究——以西南絲綢之路為中心》，雲南美術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5 頁；另可參考王遵仲等譯 GF Hudson《歐洲與中國》（"Europe and China"），1995 年版，第 27—74 頁；郭一《可觸摸的歷史——雲南民族文物古跡》，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86—87 頁。

[94]劉欣如《印度古代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41—147 頁。

[95]王遵仲等譯 GF Hudson《歐洲與中國》（"Europe and China"），1995 年版，第 74 頁；F. R. Allchin,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Historical South Asia—The Emergence of Cities an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 1995, p. 293.

[96]梁加農《賽里斯(Seres)略考》載朱新予編《中國絲綢史：專論》，中國紡織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19—321 頁。

[97]張新宇《印度絲綢發展及現狀評估》，載《南亞研究季刊》，2000 年第 1 期，第 18 頁。另外，石田幹之助則慮為漢代的絲織是由西北絲路傳入，西南絲路的存在卻沒有討論，見石田幹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商務印書館，民國 30 年，初版，第 16—21 頁。當然，也有學者否定中國西南存有滇緬的貿易交通，如：吳俊才在其著作《印度史》便沒有提及任何有關漢代西南滇緬的貿易，吳氏著《印度史》，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第 23—25 頁及第 75—77 頁；田昌五、漆俠主編《中國封建經濟史（秦漢部份）》中亦對西南絲路貿易隻字不提，田氏書，齊魯書社，1996 年版，第 478—483 頁。另外，王以鑄譯（蘇）阿甫基耶夫《古代東方史》，三聯出版，1956 年版，第 738—739 頁及（印）R. 塔帕爾林太譯《印度古代文明》，淑馨出版社，1994 年初版，第 75—113 頁；（法）布爾努瓦著 耿昇譯《絲綢之路》，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2001 年版，第 27—31 頁。

[98]「滇越在何處？…學術界仍有分歧，大致說法有四，一是印度阿薩姆地區的古國迦摩縷波，二是孟加拉地區，三是緬甸的大剽國，四是雲南的騰沖」，袁庭棟以為「四者皆是怒江以西之地區，這就是巴蜀先民在西漢以前向南方開闢前進的最遠的一個重要據點」，詳見袁庭棟《巴蜀溯源》，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頁 78；見藍勇《南方絲綢之路》，重慶大學出版社，1992 年版，頁 8；鄧廷良說：「騰沖等地發現五銖錢，有可能是蜀地商人帶去的」；詳見鄧廷良《絲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頁 82；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關係的探索》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62—63；饒宗頤《蜀布與 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載伍加倫、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 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176—177。

[99]劉欣如《印度古代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41—147 頁。

[100]劉欣如《印度古代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41—147 頁；（法）布爾努瓦著 耿昇譯《絲綢之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7 頁。

[101] (法)布爾努瓦著 耿昇譯《絲綢之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頁。

[102] 江玉祥《古代中國西南「絲綢之路」簡論》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7頁；陳茜《川滇緬印古道初考》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128頁。

[103] 陳茜《川滇緬印古道初考》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64頁。

[104] 游修齡《「有朋自遠方來」新解》收載王子今編《趣味考據》，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3頁。

[105] 見藍勇《南方絲綢之路》，重慶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劉少勿以為「海貝主要是與周邊國家進行貿易交換得來。中原地區應是古蜀的最大貿易伙伴。…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就如今日以美元結算一樣，是用海貝以朋為單位來結算的。…當時蜀國是泱泱大國中的一個小國，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貨物直接運到中亞，多是通過轉口貿易來進行。多次轉口就把沿海諸國本不很價值的海貝，變成了中國各邦國珍寶的硬通貨…」詳見劉少勿《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經〉斷想》，崑崙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9頁；鄧廷良《絲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及80頁；郭一《可觸摸的歷史——雲南民族文物古跡》，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頁；羅二虎《南方絲路古貝考》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97—98頁；江玉祥《古代中國西南「絲綢之路」簡論》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9頁。

[106] 常璩《華陽國志》卷3《蜀志》，據劉琳《校注》，第430頁。

[107] 詳見謝崇安《略述石寨山文化藝術品中所見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跡》，載《四川文物》（成都），2004年第6期，第28—33頁。

[108] 《史記》卷123《大宛列傳》，第3166頁。

[109] 饒宗頤《符號 初文與字母——漢字樹》，2000年版，上海書店出版社，第67—74頁。

[110] 詳見謝崇安《略述石寨山文化藝術品中所見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跡》，載《四川文物》（成都），2004年第6期，第28—33頁。

[111] 古時雲南地區是不產琉璃，當來自印度。江玉祥《古代中國西南「絲綢之路」簡論》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1990年版，四川大學出版社，第37頁。

[112] 常璩《華陽國志》卷3《蜀志》，據劉琳《校注》，第430頁。

[113] 《後漢書》卷86《西南夷哀牢傳》，第2849頁；《太平御覽》卷786引《九州記》所說同；永昌郡地處東南亞熱帶地區，土地富饒，物產豐富，所以文獻記載說：「土地沃腴，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綿、絹、采帛、文繡…」等均出產。見楊毓才《雲南各民族經濟發展史》，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頁及景振國主編《中國古藉中有關老撾資料匯編》，中州古藉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頁；吳慧《中國古代商業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頁。

[114] 鄧廷良《絲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頁；「血珀以緬甸琥珀山產的最為著名，所以雲南發現的琥珀可能來自緬甸。蝕花肉紅寶石產自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等地」，詳見郭一《可觸摸的歷史——雲南民族文物古跡》，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87；王清華《西南絲綢之路考察記》，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115] 《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第2994頁。

[116] 詳見拙作《東漢永昌郡之設立與西南地區的商业發展》，載《新亞論叢》2005年第1期，第64—74頁。